

吴雁南著

東京
論史

学术文化交流纪实之一：访日记事

东京论史

吴雁南

贵州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

书 号：黔新出（93）国内字第36号

责任编辑 何正清

封面设计 吴雁南

封面题字 吴雁南

东 京 论 史

学术文化交流纪实之一：访日纪事

吴 雁 南 著

贵州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

贵州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毫米1/32 4 印张 8.4千字

版次 1993年5月第一版 1993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500册

目 录

海外来鸿·····	(1)
再出国门·····	(8)
幸 会·····	(20)
东京论史·····	(25)
在东京国际学术会议上的演讲·····	(38)
心学与辛亥风云·····	(47)
欢 宴·····	(70)
“今半”高歌·····	(74)
东京览胜·····	(78)
寄 托·····	(86)
神户行·····	(89)
孙中山和他的日本友人·····	(98)
相聚在京都·····	(107)
名园顺正·····	(116)

海 外 来 鸿

—

1990年11月4日，小颜送来一封从东京寄来的短函。里面写道：

“吴雁南先生：我们辛亥革命研究会，现在准备明年11月上旬在东京开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学术讨论会。……我们准备邀请吴雁南先生和刘望龄先生到日本来参加讨论会。从中国到日本的机费和在日本的食宿交通等费用，由我们负担。除了东京而外，我们还响导您们去京都、大阪、神户方面，……。”这是久保田文次先生代表日本辛亥革命研究会，寄来的一封充满友谊的邀请书。

日本辛亥革命研究会，无论是在日本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是很有影响的民间学术团体。三十多年来，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活动，特别是1981年以来，研究会更加兴旺起来。它创办了《辛亥革命研究》，每月定例召开研讨会，团结了大批学者，推动着日本国内的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1981年在东京举办的辛亥革命7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同中国武汉的国际学术讨论会相呼应，得到日本国内外学者的好评。加上1985年在神户举办的孙中山研究日中国际学术讨论会，1991年辛亥革命80周年纪念国际学术会议，应是日本方面举办的第三次

很有影响的关于研究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了。为了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除中国举行大规模的国际学术会议外，据说在美国的夏威夷也将举行国际学术讨论会。毫无疑问，1991年将是把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推向高潮的一年，其中演主角的将是中日两国的学界同行。在日本，除有辛亥革命研究会外，还有孙文研究会。应当说，这两个研究会都是日本全国性的学术团体，但就地理位置而论，辛亥革命研究会机关在关东的东京，孙文研究会机关在关西的神户。它们相互配合，互相支持，互相促进，对孙中山、辛亥革命，以至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起着促进和推动作用，为中日两国的学术文化交流都做出了可喜的贡献。他们为什么如此热衷于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研究？日本朋友告诉我，他们爱好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不外乎二个原因：一是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二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创建了亚洲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对亚洲的社会变革具有深远的影响；一是这次革命同日本有着特殊的机缘，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曾以日本为重要基地进行革命活动，并得到日本志士的同情和支持，在中日关系史上，辛亥革命可以说是与中日两国相互关连的历史事件。正是因为如此，日本学者十分重视对辛亥革命的研究，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作为中国的研究者，对日本同行所做的贡献，亦深怀敬意。

久保田文次先生是日本女子大学教授，是日本有名的辛亥革命史专家。日本出版的一部词典介绍了他的学术成就。他对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特别是有关辛亥革命性质的论述，给我本人很大启迪，受益匪浅。他同我多次在有关的国际学术会议上相见，可说是老朋友

了。他对辛亥革命研究和日本辛亥革命研究会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中村义先生告诉我，起初日本辛亥革命研究会人数很少，只能不定期举行活动。1975年，以野泽丰先生、久保田文次先生为中心，得到了一笔资助经费，对研究会帮助很大。野泽丰同久保田文次、中村义、小岛淑男、藤井升三诸先生成为研究会的坚强核心。现在研究会机构还一直设在久保田文次先生任职的女子大学。日本辛亥革命研究会是民间研究团体，经费靠自筹——多半靠会员掏腰包，正如来信中说，“没有权和钱”。在人们的心目中，无权无钱是办不成事的。但是这个研究会靠自立更生，不仅存在下来，而且兴旺发达，这似乎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的出现，首先是研究会有一有很高声望和权威的核心，同时也因为他们善于把各方面的人士团结在一起。就久保田先生而论，他 谦 诚 务 实，埋头苦干，不辞辛劳。有着火一般的热情，同他接触的人无不为此种热力所吸引。他善于社会活动，同日本学界知名人士、社会名流和青年朋友都有着联系，同宫崎滔天、梅屋庄吉等诚挚支援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友人的后代，都有密切的联系。在他的周围还聚集着一批很有作为的青年学者。他同辛亥革命研究会的活动得到了日本社会多方面的支持。我虽然很少同他促膝交谈，却知道他是日本出类拔萃的学者。他代表日本辛亥革命研究会写的这封信，虽然讲了一些客气话，基于我对久保田文次先生的了解，对辛亥革命研究会的日本同行的敬重，毫不犹豫地致书表示谢忱，并按例寄去了本人的有关学术资料。

二

1991年4月26日，日本辛亥革命研究会会长野泽丰先生寄来请柬，注明由日方负担往返机票在内的一切费用。起初我以为这笔开支有社会资助，后来才知道这次国际学术讨论会的经费多半由会内自筹。据说，野泽丰先生就贡献了一百多万日元。

野泽丰先生是日本著名的中国近现代史专家。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较早关心中国、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先驱之一。1976年被推为日本历史学研究会委员长。先后任中央大学商学部、东京都立大学人文学部、骏河台大学法学部的教授。他勤于治学，思想开拓，著述很多，堪称是著述等身的大家。在诸多的著作中，岩波书店出版的《孙文与中国革命》、《辛亥革命》两书早已是享誉日本史坛之著。他在史坛上虽已硕果累累，却从不赞成一枝独秀，而把着眼点放在整个史坛的繁荣昌盛，期望出现一个万紫千红、百花齐放的局面。因此，他着意扶持中青年学者，除积极推进辛亥革命研究会的工作外，他主持的日本辛亥革命研究会出版了《辛亥革命研究》杂志，其后又自任发行人出版了《近邻》杂志，积极为人们提供研究和发表成果的条件。有人评论说：“两份杂志每期均刊有多篇内容充实、立论缜密的研究论文及研究动态、资料介绍文章等等，堪称日本辛亥革命史研究乃至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学术领域中的双璧。”能够在这两份刊物上发表文章的学者自然也将得到人们的青睐。现在，他所主持的辛亥革命研究会，已涌现出一批有作为的研

究者。

野泽丰先生又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学者，对社会主义中国始终抱着友好的态度。1964年夏秋之间，他受日中友好协会的派遣来我国，历访上海、北京、西安、延安、武汉等地。1981年，他参加了我国在武汉举办的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此后，又多次参加我国举办的有关孙中山、辛亥革命、抗日战争等多方面的会议，并先后应邀到长沙、武汉、北京、上海的有关高校、研究机构访问讲学。尤其是在湖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的讲学，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更进一步增进了对湖湘学者以至中国学者的友谊。比起同久保田文次先生，我同野泽丰先生的接触更少一些。却得到他很多关照，多次给我寄来资料。据久保田先生来信，邀请我和刘望龄访日，是野泽丰先生提议，经研究会讨论通过的。刘望龄先生很赞赏日本辛亥革命研究会自定邀请名单的办法。京都大学狭间直树先生在一次宴会上表示，过去他们主要邀请北京学者，东京开了个好头，今后也要邀请南部中国的学者讲学。他同森时彦先生也都打算再访西南。野泽丰先生扩大邀请中国学者的范围，也许算是一个突破。

三

这次访日，我们感谢东京的热情邀请，也很感谢神户、京都的朋友的热情接待和安排。

在野泽丰先生发出邀请书不久，我接到了神户学院大学中村哲夫教授的来信。信里写道：“吴雁南教授：东京辛亥

革命研究会邀请您，我们孙文学会亦欢迎您来日。”“10月31日上午，我的大学——神户学院大学招待您们，请您和桑兵先生对学生和一般市民讲话，希望您讲《辛亥革命和日本》……。”

不久又收到京都大学狭间先生的来信，欢迎我们到京都一行。这都使我十分感动。狭间先生是我的老朋友，表示欢迎，自属意中之事。中村先生同我只见过两次，彼此很少接触，他代表孙文研究会主动同东京辛亥革命研究会联系，精心安排我们在神户的活动，则非事先所曾料及。细想起来，这也并不突然。中村先生曾在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做过一年的访问学者，同我在中山大学的友好时相过从。那时候，他已是神户学院大学人文部教授，是很有建树的学者了。他担任过《孙中山研究日中国际学术讨论会报告集》一书的编辑工作，发表和翻译了有关中国的著作多种，对中国的情况多有了解。中国有句老话，以文会友。大概是彼此通过文字上的接触，早已有所了解而彼此相知罢。1990年3月，因孙中山基金会筹备会聘任我为理事，奉旨到中山市中山故居参加孙中山基金会成立大会。中村哲夫教授出于对中山先生的敬仰，特地从日本赶来赴会，他特地将新著《移情阁遗闻：孙文与吴锦堂》一书相赠。该书在版权页上印的是“1990年3月30日初版第1刷发行。”而他赠书的时间则是孙中山基金会成立那天1990年3月11日，如果加上他从日本赴我国中山市的时间，他从出版机构拿到书至少是3月上旬，要比正式发行的时间早二十多天。这也许是经过努力，出版机构特地为他提前装订出来的罢。作为著者、朋友之间的赠书，看起来似乎是平常的事，而他赶在与中国学者见面的机会，尽早将书送给

我同其他中国同行，却寄寓着深情，寄寓着加强中日两国学术文化交流的一种紧迫感。我得到他这本大作，也颇有先睹为快之感。1985年我虽然没有参加神户举行的孙中山研究中日国际学术讨论会，读了《移情阁遗闻：孙文与吴锦堂》一书，的确大开眼界，使我对神户与孙中山有了进一步了解，对那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有了进一步了解。这样，我同中村先生开始了交。往不言而喻，这种交往是建立在彼此了解的基础之上的，因而一见如故。新交成故人，在生活中也许是常有的事，不过在同国外同行的交往中却属少见。

再 出 国 门

1991年秋访日，是我第二次出国。上次出国是在1987年10月，是由丁廷模同志临去美前二十多天，决定让我与李汀若同志参加的，几乎很少准备，如果有所缺失，倒却也有客观因素可以推脱。而此次赴日，日本朋友早在一年前就把邀我访日的意向相告，应当说在时间上是相当充足的，如果不做充分准备，则是无言以对，更有负东道主的一番盛情。偏巧1991年的教学任务十分繁重，我除了指导二个方向研究生三人的毕业论文，给他们上三门课外，还要帮助他们联系工作单位，很难集中精力撰写论文。因而决定不参加武汉举行的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最大限度内集中力量，撰写论文，去东京参加日本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的国际学术会议。这几年来，我的研究逐渐向传统学术与中国维新运动的关系倾斜。最初，我想写一篇“‘心学’与清末风云”，考虑到同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学术会议的主题的距离远了一点，于是改为“‘心学’与辛亥风云——兼论辛亥革命后中国近代化过程的反复与曲折”。这是从传统文化的视角探索近代革命运动的一个尝试，弄得不好也会贻笑大方。1991年秋，我去北京办理签证手续，很想就这个问题向一些

同行请教。可是，在我的朋友中几乎没有人对这个问题产生过兴趣，寻求支持的目的也就落了空。好在这次出国是从上海乘机直抵东京，在那里还有一些好友研究辛亥革命。由于民航局要求在三天前到上海办理“证实”手续，我提前几天赶到上海，有机会同上海师范大学赵宗颇、夏菊芳教授朝夕相处，促膝交谈，使我受到很大教益。赵宗颇先生，原是我在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读书时的教师，负责思想工作，按东北师范大学的规矩应当称作先生，也就是老师的意思。他却从来不以先生自居。夏菊芳同志是东北师大中国近代史专业研究生，同赵先生结为伉俪后，按规矩自然应当称作师母。可能由于他们二位的平均年龄还比我稍小一点，更由于赵宗颇先生从不以老师自居，再加上许多年来社会上不那么讲究名分，我们就一直以同志相称。这样相称虽倒觉得亲切，却颇有不拘名分的势头，只是叫惯了不好改口，将错就错。在生活中，也许人们对这种将错就错的现象并不介意，细究起来，几乎比比皆是。不用说，宗颇、菊芳两位先生对此并不介意。此次相见，如鱼得水，特别亲切。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我们见面的时间虽然很少，但彼此声息相通，文字、书信往来从未间断。我在关键时刻，总是得到他们的帮助。

1981年，我主编《中国近代史纲》，到上海定稿，得到他们的特殊关照。没想到，一阔别就是十年。说来也巧，近二十年间，我三次到上海师范大学拜访宗颇、菊芳二位同志，每次相差大体是十年左右。记得我第一次到上海拜望宗颇、菊芳同志，是在1972年冬，那时宗颇同志正患类风湿病躺在床上，菊芳同志既担任繁重的教学任务，又要照顾宗颇同志，还得抚育两个年岁不大的孩子。据了解，类风湿是十分

难治之症，一般都会瘫痪，长卧不起。这对菊芳、宗颇二位同志来说，不能不带来很大压力。幸亏他们平时睦邻敬友，各方面的关系处得很好，在大家的关心下，找到了一个老中医。老中医的祖传秘方，果然有效，宗颇同志的病有了好转。但是，就在这骨节眼上，这位中医却带着自己的秘方见马克思去了。在这种情况下，宗颇同志以惊人的毅力，辅之以治疗，战胜病魔，逐渐恢复健康。二三十年的风风雨雨，生活中的潮起潮落，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伴随病魔给人带来的各种辛酸，对生活中的强者来说，也许不会有更多的坏处，反而会使自己更加挺拔、坚强、激越。宗颇同志早年冒着生命危险，穿过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线到佳木斯参加革命队伍。菊芳同志也是解放前就参加革命的老布尔什维克，饱经锻炼和考验。他们总是那样冷静，坦荡和乐观，不论对什么事，总是泰然自处，充满信心，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这次见到宗颇同志，他不仅健康超过平常人，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也取得了卓著的成就。菊芳同志动如春风，平如秋月，也很乐观健康。他们都在担任日本留学生的教学工作，为中日学术文化交流做出贡献。对这样的良师益友，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他们还对我去东京的学术论文，提供了很宝贵的意见，特别是指点宋教仁研究王学的资料给我很大帮助。在撰写《“心学”与辛亥风云》一文时，我曾翻阅过宋教仁的文集，偏巧就没有细查他的日记。宗颇同志提出在宋教仁日记中有这方面的材料，我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仔细检阅了宋氏日记，果然大有所获，使论文增添了不少声色。由于我未曾到日本进行学术活动，对日本的风土人情，只有一鳞半爪的书面知识，唯恐言行举止出现失礼的地方。宗颇、

菊芳同志同日本人接触较多，除自己介绍一些情况外，还特地把多次赴日讲学的郭豫明教授请来，让他给我介绍情况。郭先生是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专家，同我是老同行老朋友了，这几年却很少相见，实在不知他几渡东瀛的情况。老友相见，自然无所不谈。他特别叮嘱我，到日本去要多带几件衬衣，几双袜子。我早就听伊原泽周先生说，日本学者很讲究卫生，每天要换一件衬衣，郭先生的说法恰好同伊原所云相印证。我已带了5件衬衣，为了服从指导，第二天又到商场买一件衬衣；到日本后由于洗衣非常方便，实际上只动用了四件衬衣，不过多有两件作后备，也可能胆壮一些，万一有点差错也不至于出洋相。郭先生这种有备无患的态度，其中凝聚着丰富的处世经验。到日本为什么要多带袜子，原因是日本风俗，在不少场合都得脱鞋进屋，如果袜子破旧或不干净，对主人自然是不敬之举。日本国是世界上最讲究礼节的国家，必须入境从俗，尊重主人的风俗习惯和礼节。据郭先生说，他感到最不习惯的是跪地吃饭。他所谓的“跪”，在日本实际是一种坐的姿式。在古代，人们是席地而坐，这种姿态同神庙里的菩萨打盘脚不同，而是臀部坐在自己的脚后跟上，在和式宴会上打盘脚将被视作不敬之举，是不允许的。郭先生说，上五、六十岁的人跪一会儿还可以，跪久了就站不起来。偏偏宴会时间往往很长，要想三、五分钟结束是绝对不可能的。赵宗颇先生告诉我，他小时候在日本人办的学校里读书，每天晚上先生都要叫大家在榻榻米上跪一个钟头，作为练习日本礼仪的开始。郭先生强调说，在主人未有请客人随意坐之前，决不可打盘脚。听了这些说法，顿时真使人感到问题有些严重。“跪坐吃饭，可能是一大难关

啊！”但是，凭我的观察和了解，我们所结交的日本朋友，都是属于学界的开明人士，很能了解我们坐着吃饭的习惯，除非我们执意要体验和式风情，可能是不会让我们像他们一样，规规矩矩地席地而坐的，因而又觉轻松了许多。

二

在上海师大住了几天，我还没有同一起赴日的几位同行取得联系。10月22日，我正打算到徐家汇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去打听刘望龄等同志的行踪时，突然有同志告诉我，刘望龄来了。刘望龄教授，是我的老朋友，也是至交。在辛亥革命史研究方面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就。近几年来，他在章开沅先生担任华中师大校长期间，极力支持章开沅同志的学术活动，承担起武汉地区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的实际工作任务，主持编辑出版了章开沅主编的一些专著，并为我国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的国际学术活动做出了贡献。他的学术、道德、人品都是第一流的。这次有他同我们同行，自然会给我们提供很多方便，并大壮行色。

刘望龄为何突然而降？原来，他同湖南师范大学教授饶怀民约定在上海师范大学相见。他是特地来找饶君的。饶怀民先生是章开沅先生的高足，也是刘望龄的学生。近年来，由于他对辛亥革命人物的研究取得了突出成果而蜚声史坛，成为学界的后起之秀。我同饶怀民同志见面的时间很少，加上不知他已来上海师范大学，虽然他就住在我的楼下，也未能通消息。此时，与刘、饶二同志不约而在上海师大相聚，真是喜出望外。当时，刘望龄、桑兵二同志住在上海社会科

学院历史研究所，我同饶怀民住在上海师范大学招待所。怀民同志为人坦直，讲义气，善沉思。我们同住在上海师范大学虽然只有两天，对我访日的准备工作的帮助却是很大的。当我们互相交换赴日的准备情况时，他一再提醒我，我到日本去是作一小时的纪念学术讲演，而不是去作15分钟的学术报告。我对他的讲法，一直半信半疑，一则我第一个发言的事早已先入为主，二则从未见过这样的会议安排。在东京举办的辛亥革命8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同国内的学术会议稍有不同，在学术讨论会正式揭幕之前举行学术讲演。在会议日程上，安排作学术讲演的，日方是野泽丰先生，中方是我，一共两人。大概是在1991年9月中旬，我在北京办理签证时，我的老伴何正清同志写信告诉我，收到了日方寄来的会议日程，我第一个发言。同时也收到刘望龄先生来函，说是日方对我们相当重视，我第一个发言，他最后发言。我回到贵阳，检阅会议日程表，由于我始终没有把自己看作是中方的长者，上面虽写着第一天的会议是作纪念讲演，从第二天起开始学术报告，第二天和第三天作学术报告的共17人。应当说，日程是非常清楚的。由于上述原因，我却以为，会议开始时由野泽丰先生作纪念讲演并报告论文，我排在他之后是作15分钟的学术报告。因此，我在六月份写成《“心学”与辛亥风云》一文之后，一直把在神户学院大学的报告当作重点。饶怀民先生对我的好意提醒，一方面在我的脑际划了几个问号：日本辛亥革命研究会是否会作这样安排呢？……。同时也觉得他说得有些道理，认为怀民同志是个治学谨严细心的青年学者，对他的意见不能等闲视之，决定做好两手准备，免得临阵磨枪，造成被动。在东渡的头一天（11月23